图片来源：百度

去博物馆上历史课，到花园里学单词，和年过花甲的老奶奶一起上讨论课，一对一地与导师面对面交流，参加“工作坊”……这都是海外学子的课堂体验。“花样百出”的留学课堂给他们带来了满满的收获。让我们听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眼中的特色课堂究竟什么样——

“花样百出”的留学课堂

□全君娣

课堂不在教室中

2016年10月的一天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来到芬兰国家博物馆门口的冷聿涵有些激动，因为今天的历史课将在博物馆进行。从入口处开始，杯子、货币……博物馆里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历史，都由一位馆内讲解员娓娓道来。和平时自己去博物馆的“走马观花”相比，这种方式让冷聿涵觉得收获颇多。冷聿涵在参观完博物馆后还撰写了学习日记，虽然是“老师要求却并不觉得无话可说”。她在学习日记中以“今天参观中印象最深刻的文物”为题，表达这次上历史课的感受和收获。“通过参观博物馆走近历史”，冷聿涵认为这比一般的课堂更令她印象深刻，“很喜欢这种教学方式”。

冷聿涵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留学的1年里，这样的“课外教学”十分常见，上文学课、历史课，老师经常带学生去图书馆、博物馆和有特色的作家故居参观，请讲解员及学者为学生讲解。

去花园里教授动植物的名称，去图书馆、实验室、餐厅等地方教授每个东西的单词及相关表达，“所见即所教”，学生可以随时提问——这种“课外情景教学”对留学于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的宋正尧来说亦是家常便饭。

留学澳大利亚的安琪参加的“做饭工作坊”一角。

他还记得有一次，老师带他们参观学校里的一栋陈旧的民居楼，他没想到平日里可以自习的楼竟是“于韦斯屈莱市最老的建筑”。跟随老师的脚步，听着老师的介绍，宋正尧对民居每一处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坐在多功能厅里看着相关的视频和老照片，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映入脑海。民居楼里有咖啡厅、厨房，宋正尧还和老师同学一起做手工、做咖啡，围坐一起，以“茶话会”的形式上了这节课。这种上课方式是宋正尧从未有过的“新鲜体验”，“觉得听课更有动力”。

碰撞出思想火花的“讨论课”

在于韦斯屈莱大学的一个教室里，坐着来自东亚、北欧和中东欧等世界各地的同学，有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，还有年过花甲的老奶奶，甚至非学生身份的丈夫、妻子也带着孩子一起来学语言。据宋正尧介绍，课上，老师只负责布置课题、课堂导向、答疑和总结，学生讨论才是“重头戏”。拥有不同国籍、年龄和身份的他们坐在一起，有文化冲击亦有年龄代沟，而相异的背景和人生经历却让课堂讨论碰撞出不一样的思想火花，令人“收获不浅”。

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张艺告诉笔者，他所在学校的课堂小组讨论一般只有12人。老师会深入到每两人一组的小组讨论中，鼓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和交流想法，并提供指导。“不管你有没有想法，一定要跟老师有所交流，其实这就是参与课堂的过程。”

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读书的安琪同样表示讨论课“课堂参与度很高”。因为讨论中的表现计入平时成绩，所以只有课前充分准备才能跟上课堂讨论的节奏。

受益匪浅的“个别辅导课”

又到了一周一次的“辅导时间”，张艺带着她的论文敲开了导师办公室的门。虽然每周只有短短的20分钟，但张艺却格外珍视“辅导时间”里和老师一对一交流的机会。论文上的批注，老师会在这段时间里做出细致的解释和反馈；常犯的错误，老师会耐心指出并提出改进建议；课上忘记问的问题，也可以在这时候请教老师……“我觉得老师和学生的这种‘连接’，不仅使学生可以及时得到反馈完善自己，还让老师更加了解学生的情况，方便课堂的组织管理，是一种‘双赢’。”张艺说。

曾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留学的罗懿蓉亦从“个别辅导课”中受益匪浅。在她看来，“个别辅导课”是很好的补充。主讲教授每周会根据讲授的内容布置习题，辅导时间则由助教讲解，组织学生讨论消化习题。由于“个别辅导课”人数较少，老师给予每个学生的关注会更多。每一次辅导课都令罗懿蓉历历在目。有一次在计量课的辅导课上，罗懿蓉小声嘀咕了一下“这里我不会”，助教老师就走到她身边，耐心地指导她一步一步做完习题。“我特别喜欢辅导课，可以从中很快获益。” 罗懿蓉说。

五花八门的“工作坊”

在一个只有20人左右的工作坊里，学生是展示和表达的主角，他们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组队，选择要讨论的主题，在课堂上做报告、讨论和辩论。在法国埃克斯政治学院留学过的雷润洲曾参加过一个叫作“当代国际政治与外交”的工作坊。她还记得一次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同学组队，讨论有关非洲的问题，这促使原本对非洲了解不多的她“打开了新世界”。来自不同国家同学的发言让她看待问题的角度更加多样，旧的思维得以发散，新的信息得以补充。有时候，他们还会模拟联合国辩论，每个人不代表自己的国家而是代表其他国家，了解他国国情和需求，体会站在他国立场看待问题。雷润洲觉得这是“开阔眼界，锻炼思维”的好方式。

安琪告诉笔者，澳大利亚学校的工作坊相对轻松活泼。去参观悉尼最大的动物园，去观赏一些比较有名的学生摄影师的摄影展，到海边做海滩烧烤、踢沙滩足球……这些“工作坊”，不失为结交朋友、锻炼口语、融入当地生活的快捷途径。安琪曾参加过一次“做饭工作坊”，18个学生两两一组。在厨师演示完后，安琪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，第一次学做炒饭难免有些慌乱，但有老师和同伴的帮助，“经过一番折腾”，泛着诱人色泽的炒饭出锅。大家一边吃着炒饭一边交流，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次别样的“课”。

新西兰向中国学生抛出橄榄枝

本报记者　赵晓霞

来自新西兰移民局的数据显示，2017年在新西兰注册的中国留学生总人数为40323人，在注册在读国际学生人数中占比最高，接近30%。

工作签证新政颁布

日前，由启德教育发布的《2018新西兰留学报告》（下称《报告》）显示，中国学生选择去新西兰留学的原因为：环境文化、教学质量、性价比高的留学费用、就业政策优势和安全因素；此外，新西兰院校一直以来都可以颁发双录取，既使没有语言成绩，学生也可以申请新西兰留学，签证政策也较其他热门留学目的国更为宽松与简化。

据介绍，今年8月，新西兰移民局颁布了工作签证新政策，新政主要集中在四点：首先是取消了所有级别的雇主担保工签，学生毕业后找到工作即持有开放性工作签证；其次，奥克兰地区的大专和学士后文凭毕业生可获 1 年工作签证，如就读需要职业注册的学生，可额外获得 1 年工签；第三，非奥克兰地区的大专和学士后文凭毕业生有机会直接获得两年工签；第四，本科学士学位以上学历可获 3 年工作签证，研究生课程申请人，其配偶可以办理配偶工作签证，未成年子女可以享受公立中小学免费教育。

“今年新西兰发布了一项新的《国际教育战略2018-2030》，其目标旨在为广大学生提供卓越的教育品质和良好的留学体验等。”新西兰驻华大使馆教育参赞白若兰说。

7所公立大学接受高考成绩

来自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的数据显示，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，在新西兰留学的中国学生中，其中38.58%在大学就读，21.64%在中小学就读。2013年至2017年，赴新西兰留学的国际学生，就读本科学历以下课程的学生增长了17%，就读本科学历课程的学生增长了26%，而就读硕士及以上学历课程的学生增长了63%。

就此，启德教育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，硕士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，是2014年新西兰多所大学推出了授课类硕士课程，因其学制短、入学标准明确、录取率高、专业选择丰富、开学时间灵活等优势，推动了硕士研究生人数大幅增加。

《报告》显示，本科留学新西兰有3种方式：第一种是通过预科衔接本科；第二种是国内高三学生使用高考成绩和雅思成绩，申请本科直录。目前新西兰有7所公立大学（其中，林肯大学为大部分专业）接受中国高考成绩，具体要求为申请人高考成绩达到当地一本线或70%以上，雅思成绩达到6分；第三种为国际大一文凭课程，适合于高中毕业或已完成高二课程的学生。

多关注相对冷门地区

另据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数据，奥克兰、坎特伯雷和惠灵顿三个地区最受国际学生欢迎。

在留学地区选择上，《报告》建议中国学生可以多关注相对冷门的新西兰北岛中部四区：霍特斯湾、塔拉纳基、旺加努伊和马纳瓦图。因为中部四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，毗邻首都惠灵顿，英语语言学习环境优良，在这里学习，能够更好地融入新西兰当地的生活。

中国学生留学新西兰学历构成与变化图表

留学记

瓦格纳太太（上）

□杨明强

两年前，在德国哥廷根火车站旁的公寓暂为栖身20余日后，我搬到该城以北8公里处的博文登居住。得益于当地政府为学生提供的福利，每天坐着近乎免费的公交车来回于小镇与学校之间。

年初荒芜的四野，4月阴晴雨雪在1小时内几次交替变化的恼人天气，秋天缀满苹果的路边果树，还有冬天短暂的白日、暗淡的风景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景象。经历了两番自然的枯荣，沿途这般风景的变换早已烂熟于心，没有太多的惊喜。不过，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“老外”，在小镇公交上总是一个陌生而又醒目的存在，偶尔也能激起他人的好奇心。因此，在从家到学校那20多分钟的车程中，会和何种有趣的人相遇，又有什么故事发生，那总是一个未知的异域。20多分钟的车程，不长不短，恰到好处，它足够短，但却可以和经常在固定时间出行的人们建立默契，它足够长，却又不会长到使出行成为累赘。

德国人向来以准点闻名，在德国生活久了，习以为常的传闻也常常经不起事实的检验。不过，就个人体验来说，因僻居乡间一隅，公车班次少，反而少有晚点的现象。每天学校和住处的固定往返，再遇到一群出行规律的德国人，还有数不清因偶然机缘踏进公车的过客。往往，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，操着各异的语言，言谈中或漠然或欣然的喜乐哀怨，种种情形总是让人回味。

公交车上我最先认识的是瓦格纳太太，其实我真正认识她是在博文登。之前，我接受了房东太太的提议，陪其爱犬莱卡出门3次，可得5欧元的薪资。1月的一个傍晚，寒风吹得带劲，我浑身严实包裹之后牵着莱卡出门。刚出门不远，一位中年太太向我走来，略显拘束地向我打招呼，称自己是瓦格纳太太，我们经常乘坐同一趟公车，在车上已见过多次。短暂的寒暄之后，我们互相做了简单的介绍，就算是认识了。

我们一边走一边聊。我得知她在城里的一所幼儿园上班，先生在家里，还有一个儿子在哥廷根大学化学系博士在读。她和她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相识于哥廷根，那时她先生还是哥廷根大学法律系的学生，临近毕业，报名参加了德国国家司法考试，遗憾的是没能通过。按规定，还可以再参加一次司法考试，但她先生无意再背法律条文，于是回家对她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去工作吧，我在家做家务行么？” 在亲友的一片质疑声中，瓦格纳太太同意了丈夫的想法，出去工作，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据瓦格纳太太说，女主外男主内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德国还算新鲜事……当时，我刚到德国不久，表达往往词不达意，不过瓦格纳太太毫不失幼儿园老师的耐心和细致，不时帮我搜索词汇，以表达我的未及之意。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当回到最初碰头的地点时，瓦格纳太太言及她家就在几步远的一条街上，我这才发现我们是隔了一条街的邻居。

自此以后，我又多次在车上碰到瓦格纳太太，她常背着一个绿色的双肩包，偶尔还背一把吉他。我笑问她是不是才开了演唱会回家，她坦言幼儿园老师在德国不容易，相比于其他职业的年假，她们的假期要少得多，加之家庭经济原因，她的年假更少，仅两周时间。

一次，我刚踏上公交车，就发现瓦格纳太太独自坐在车厢中部的位置上，脚边堆放着几个箱包，看似要出远门。寒暄之后，她很快解释了我的疑惑，她打算和先生去瑞士度假。

她的先生坐在车厢后面，也起来向我挥手。并从车厢后面拉着车上的扶手走到前面来，猝不及防地问了我一句：“你在哥廷根读德语文学博士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 对于这样的开场白，我一下还没来得及反应。

紧接着，他从右边的衣服口袋里抽出了一本尼采的《悲剧的诞生》，并告诉我他最近在读尼采，“你读过吗？尼采可不好读呀。”

“读过，但我读的是中文译本。如果您觉得读起来困难的话，或许可以看一看萨弗兰斯基写的《尼采思想传记》”。

“我家里也有这本书，不过萨弗兰斯基也不好读。”聊了一会儿尼采，他又从右边的衣服口袋抽出一本黄皮小书，上面印着克莱斯特的名字。作为独树一帜的浪漫派作家，克莱斯特曾经写过剧本。瓦格纳先生说打算在瑞士度假期间读读克莱斯特。我还没来得及再做出回应，车厢正晃动得厉害，他站立不太稳，致歉之后匆匆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了。瓦格纳太太在旁边及时补了一句，“哦，对了，我先生最近在研究哲学”。

2016年10月下旬的一天，我临时出门，打算为即将到来的生日再添购一些酒水。刚走到下一条街口，遇上了正在自家车库附近清扫落叶的瓦格纳太太。也算相识已久，我邀请她参加我周日中午的生日聚会，她慨然允诺。

生日那天，我备的是家常饭菜。客人不多，几个中外朋友，再加上房东夫妇。瓦格纳太太准时按响了门铃，送了我一个烤制的小蛋糕。过了一会儿她也开始一起包饺子，尽管一头白头发在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中显得特殊。

（作者为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生）